



马克思传

弗·梅林 著

马 克 思 传

弗·梅 林 著

樊 集 译 持 平 校

(上)

人 民 出 版 社

01-7
445
上

出版者说明

本书作者弗兰茨·梅林(1846—1919年)是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杰出的理论家、政论家、历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

《马克思传》是梅林的主要著作之一，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到他逝世以后(1919年)才出版。这部著作是梅林长期收集、研究、校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遗著的总结。在这部著作里，梅林叙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经过，叙述了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立和活动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以及第一国际建立的历史。

梅林的这部著作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错误和缺点，例如，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拉萨尔和拉萨尔派的斗争和意义的错误理解，在某些问题上为巴枯宁辩护，以及对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福格特先生》等重要著作的意义估计不足，等等。译者已在本书书后的译者注释中分别做了一些必要的说明。

本书是根据1957年出版的俄文译本转译的，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狄茨出版社1960年德文原本、纽约科维奇与弗里德出版社1953年英文译本、东京大月书店1953年日文译本和三联书店1953年中文译本(罗稷南译)。为便于读者阅读起见，译者对书中的一些历史事件、组织、掌故等做了注释，全部附在书后。脚注是从俄文版摘译的。

目 录

出版者说明

序言	1
第一章 青年时代	6
(一) 家庭和学校	6
(二)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12
第二章 黑格尔的弟子	17
(一) 柏林的第一年	17
(二) 青年黑格尔派	25
(三) 自我意识的哲学	33
(四) 博士论文	38
(五) 《秩文集》和《莱茵报》	46
(六) 莱茵议会	52
(七) 斗争的五个月	60
(八)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71
(九) 结婚和被逐	75
第三章 流寓巴黎	79
(一) 《德法年鉴》	79
(二) 哲学的展望	87
(三) 论犹太人问题	93
(四) 法兰西文化	99
(五) 《前进报》和被逐	105

第四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18
(一)办公室和兵营	118
(二)英国文化	126
(三)《神圣家族》	130
(四)社会主义的奠基	140
第五章 亡命布鲁塞尔	146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	146
(二)真正的社会主义	150
(三)魏特林和蒲鲁东	156
(四)历史唯物主义	163
(五)《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173
(六)共产主义者同盟	181
(七)布鲁塞尔的宣传	186
(八)《共产党宣言》	194
第六章 革命和反革命	201
(一)二月和三月的日子	201
(二)六月的日子	204
(三)对俄战争	209
(四)九月的日子	216
(五)科伦的民主派	223
(六)弗莱里格拉特和拉萨尔	228
(七)十月和十一月的日子	238
(八)伏击	238
(九)又一次伏击	245
第七章 流寓伦敦	249
(一)《新莱茵评论》	249

(二)金克尔案件	255
(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	260
(四)流亡中的生活	269
(五)雾月十八日	276
(六)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282
第八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	292
(一)天才和社会	292
(二)无双的联盟	300
第九章 克里木战争和危机	309
(一)欧洲政治	309
(二)大卫·乌尔卡尔特、哈尼和琼斯	316
(三)家庭和朋友	320
(四)1857年的危机	329
(五)《政治经济学批判》	336
第十章 王朝的兴替	346
(一)意大利战争	346
(二)同拉萨尔的争论	353
(三)流亡者之间的新斗争	363
(四)插曲	375
(五)《福格特先生》	383
(六)家事和私事	388
(七)拉萨尔的轰动	400
第十一章 国际的创始	413
(一)成立	413
(二)国际的成立宣言和章程	421
(三)同施韦泽的决裂	429

(四) 伦敦第一次代表会议	435
(五) 德国战争	444
(六) 日内瓦代表大会	453
第十二章 《资本论》	465
(一) 阵痛	465
(二) 第一卷	469
(三) 第二卷和第三卷	481
(四) 《资本论》的遭遇	493
第十三章 国际的全盛时代	501
(一) 英国、法国、比利时	501
(二) 瑞士和德国	509
(三) 巴枯宁的鼓动	518
(四)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527
(五) 巴塞尔大会	534
(六) 日内瓦的纷争	541
(七) 《机密通知》	549
(八) 爱尔兰大赦和法国全民投票	555
第十四章 国际的衰微	559
(一) 色当以前	559
(二) 色当以后	567
(三) 法兰西内战	576
(四) 国际和公社	584
(五) 巴枯宁主义的反对派	598
(六) 伦敦第二次代表会议	604
(七) 国际分裂的根源	611
(八) 海牙代表大会	618

(九)余痛	629
第十五章 最后十年	638
(一)马克思在家里	638
(二)德国社会民主党	645
(三)无政府主义和东方战争	655
(四)曙光	659
(五)暮色	670
(六)最后一年	673
著者关于参考文献的说明	679
译者注释	693
马克思传记年表	733
人名索引	790
人名译名对照表	835
报刊索引	858
报刊译名对照表	868

序 言

关于这本书的来历，有一段小小的掌故。有人提出要出²⁵版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夫人表示同意(这件事必须得到她的同意)这个建议，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我作为她的代理人参加该通信集的编辑工作。1910年11月10日，她从德拉伐尔写了一份委托书来，全权委托我作一些我认为必要的注释、说明和删节。

然而实际上，我并没有行使这项权力。在出版者们之间，或者更确切些说，在出版者伯恩施坦(因为倍倍尔只是挂个名而已)和我之间，并未发生过任何重大的分歧。如果不是必要，那末我去干涉他的工作，当然是没有理由、没有权利的，我也不愿意这样做，否则就不符合委托者的初衷了。

但是，在编辑该通信集的很长一段时期中，由于以往多年研究而在我脑海里已经成型的卡尔·马克思的形象，变得更为鲜明突出了。因此，不由地想写一部传记来刻划这个形象。而且我知道，这个主意一定会使拉法格夫人非常高兴。我之所以获得她的信任和友情，绝不是因为我在她心目中是她父亲的最博学最贤明的学生，而是因为，在她看来，我比别人更了解他的为人，因而也就能够在这方面描写得更为真实。她曾不止一次地写信并且口头告诉我，说一些几已忘怀的关于她父母在世时的家庭往事，她在看到我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一书中、特别是马克思遗著中的描述以后，又重新回忆起

来了；还说她当年常听父母提到的一些人名，也因为我跟具体事例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当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出版时，这位品格高尚的妇女已经去世好久了。她在死前几小时还写了一封信来，对我致以亲切的问候。她禀承了父亲的豁达胸怀。她信托我出版马克思遗著中的许多珍贵材料，并且让我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判断，而毫无干涉之意。例如，虽然她明明从我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一书中已经知道，我曾经怎样经常在有关拉萨尔同她父亲的争论问题上坚决地替拉萨尔辩护，她还是将拉萨尔致马克思的信交给了我。对于这一点，我将永远感激她，至死不忘。

然而，这位妇女所具有的宽宏气度，在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卫道者身上却一点也找不到。当我着手执行自己的计划，即着手撰写马克思传的时候，他们两位就义愤填膺地大叫大嚷起来了。其理由是我在《Neue Zeit》（《新时代》）上竟没有完全迎合党内流行的说法，而就拉萨尔、巴枯宁两人和马克思的关系问题发表了一些自己的意见。首先，考茨基斥责我“反对马克思”，特别是斥责我“辜负”了拉法格夫人的信任。而因为我仍然坚持要把马克思传写下去，他竟然拨出《新时代》的如此宝贵篇幅中的整整六十页来刊载梁赞诺夫的抨击文章¹。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企图确证我犯了最可耻的背叛马克思的罪行。他对我大加非难，其言词之歪曲捏造只能和其论点之荒诞无稽相媲美。由于某种感情（为了礼貌起见，我不愿说出这是一种什么感情）的驱使，就听任这些先生们肆意谩骂去吧，但是应该声明，我对于他们这种精神上的恐吓手段不曾丝毫让步，并且在本书中叙述拉萨尔、巴枯宁两人和马克思的关系

时始终以历史的真实为依据，而完全不理睬党内流行的说法。当然，这时我仍然避免作任何争论，只是在关于参考文献的说明中对于考茨基和梁赞诺夫向我提出的主要责难略加嘲讽，以便对做这方面工作的较年轻的人们有所助益，因为这些年轻人现在正应该养成习惯，对马克思主义教区的教士们的气势汹汹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如果马克思在实际上真像马克思主义教区的教士们所赞赏的那样，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少年，那末我就不会醉心于写他的传记了。我的赞美，正和我的批评一样，——在一本好的传记中，这两者需要有同等分量——是针对着一位伟大人物而言的，这个人在讲到他自己时常常喜欢说：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²。把马克思的伟大形象不加修饰地重新塑造出来——这就是我给自己提出的任务。

目的本身已经决定了达到这个方法。历史向来同时既是艺术又是科学，传记尤其应当如此。现在我已记不起是哪一位古板的学者曾经发表过这样一种“不朽的”言论，说²⁷在历史科学的领域内，美学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可是我应该坦白承认，——也可以说是我引以为愧的，——甚至资产阶级社会，也不像这些道貌岸然的思想家们那样使我深恶痛绝，他们只是为了打击伏尔泰老人，就宣称传记只能用枯燥无味的体裁来写³。马克思本人在这方面也被认为是糟糕的，因为他同意他所喜欢的古希腊人的观点，把克丽娥算作九个缪斯之一⁴。实际上，只有被缪斯看不起的人，才咒骂缪斯。

倘若我可以假定读者对本书所采用的体裁会予以赞同，那末我还得请求他在内容方面不要苛求。事先，我已经不得不考虑到，虽然这本书应该写得至少使文化程度较高的工人

觉得通俗易懂，但也万万不可篇幅过大。可是现在的篇幅已经超过原计划一半了。我常常因此而不得不把一行紧缩为一个字，一页紧缩为一行，一印张紧缩为一页！在分析马克思的科学著作的时候，尤其为此感到苦恼。为了不使读者有任何误解起见，我把伟大作家传记中惯用的副标题“他的生活和著作”中的著作二字删掉了。

无疑的，马克思之所以无比伟大，主要是因为思想的人和实践的人在他身上是密切地结合着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同样无疑的是，在他身上，作为战士的一面是永远胜过作为思想家的一面的。在这方面，我们事业的所有伟大先驱者们，都有一致的看法。有一次拉萨尔说：只要实际行动的时机一到，他就定会心甘情愿地搁下笔来，不再写他所知道的事了。他们的看法有多么正确，在我们的时代，我们有着触目惊心的体会：那些用了三十年甚至四十年的时间来专心考究马克思著作中的每一逗点的一本正经的研究者们，本来到了可以而且必须像马克思那样行动的历史时机，却只是像风信标那样吱吱哑哑地绕轴自转。

不过，老实说，我并不自负比别人更能透彻地了解马克思所掌握的渊博的知识。甚至为了要在我所叙述的狭小范围内，让读者对《资本论》第二、三卷有个充分清晰的概念，我还请了我的朋友卢森堡帮忙。因为她欣然接受我的请求，写了第十二章的第三节，读者们一定会像我一样地感激她。

我的这本书由于她的珍贵手笔而增色，我为此感到庆幸；此外我们的共同朋友克拉拉·蔡特金允许我的小船打着她的旗帜驶出公海⁵，我也同样感到庆幸。在那么多“社会主义的

英勇而坚决的先进战士们”被大风暴像秋风扫落叶似地扫掉的年代里,这两位妇女的友谊,对我来说是无上的安慰。

梅 林

柏林,斯得格里兹,1918年3月

第一章 青年时代

(一) 家庭和学校

29 1818年5月5日，卡尔·亨利希·马克思生于特利尔。他的家系已无从查考，因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连年战火中，莱茵省的户籍册都已错乱失散了。要知道，就连亨利希·海涅出生在哪一年，至今还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哩！

当然，就马克思来说，问题还不至于这样严重，因为他生在一个比较承平的时期。不过，当他的一位姑母在五十年前逝世并且留下一张被认为无效的遗嘱时，法庭为查明合法继承人所进行的调查，始终也没有能确定她的父母即卡尔·马克思的祖父母的生卒日期。

他的祖父原名马克思·列维，后简称马克思，是特利尔的一名犹太律法学家⁶；他大概是在1798年逝世的，至少在1810年时他已不在人世了。他的妻子叶娃（娘家姓莫泽斯）在1810年还活着，一般认为她是在1825年死去的。

这对夫妇生了许多子女，其中有两人——希尔舍和萨缪尔——从事学术。萨缪尔在父亲死后继承了特利尔的犹太律法学家的职位。他的儿子莫泽斯作为犹太律法学家职位的候补人，到西里西亚的格莱维茨去了。萨缪尔生于1781年，卒

于1829年。希尔舍，卡尔·马克思的父亲，生于1782年。他学法律，在特利尔当律师，后来又做了司法参事。1824年，他接受了基督教洗礼^①，取名亨利希·马克思。他是在1838年逝世的。亨利希·马克思同一位荷兰女子罕丽达·普列斯堡结了婚。据她的孙女爱琳娜·马克思说，她的祖先一连许多代都是犹太律法学家。罕丽达在1863年逝世。她同她的丈夫身后留下了许多子女，但是在确定继承权(马克思家庭的谱系资料就是从这项有关继承的文件中取得的)的时候，这些子女³⁰中只有四人还活着，这就是卡尔·马克思和三个女儿：索菲亚——马斯特里赫特的律师施马里豪森的未亡人；爱米利亚——特利尔的工程师康拉第的妻子；路易莎——卡普施塔特的商人优塔的妻子。

卡尔·马克思的双亲的婚姻是极其美满的，因此，作为仅次于长姊索菲亚的最大的男孩子，卡尔·马克思的童年是在无忧无虑的欢乐中度过的。他的“辉煌的天赋”在他父亲心中唤起希望，认为有朝一日这些才能终将用于造福人类的事业；母亲则把儿子称做一个无往不利的幸运儿。但是卡尔·马克思既不像歌德那样只受母亲的影响，也不像席勒和莱辛那样只受父亲的影响。他的母亲虽然也对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关怀备至，却完全被家务缠身。她甚至终生都没有学会正确地讲德国话，也根本没有参与过儿子的思想斗争，——只是有时不禁以一个母亲的心情为她的卡尔发愁，想到假如他走上了正路的话，他的成就会有多大。后来，卡尔·马克思似乎同他母系的荷兰亲属，特别是同他的一位“舅舅”菲利浦斯接近起

① 参阅本书第9页上的注。

来。他不止一次地怀着深切的感情谈到这位“了不起的老头儿”，这人在他生活困难的时刻曾经在物质上帮助过他。

但是就连马克思的父亲有时也暗中怀着忧惧注视着爱子心灵中的“魔”。不过他在卡尔刚过二十岁生日几天以后就死去了。使他感到苦恼的不是那种梦想儿子有一个光辉前程的家庭妇女式的渺小忧虑，而是对儿子性格中某种像大理石一般坚硬的东西所感到的隐隐的恐惧，这种东西是和他自己的柔和秉性格格不入的。作为犹太人、莱茵省人和法学家，他似乎应该有三重的武装来抵御易北河东岸容克地主们的一切诱惑。然而亨利希·马克思是一个普鲁士的爱国者，不是现时所谓的那种庸俗的爱国者，而是一个老式的普鲁士爱国者，像我们这一辈人当中最年长的人还见过的瓦尔德克和齐格勒那样的爱国者。他受过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教育，真诚地相信“老弗里茨”^①式的开明改革⁷，——总之，他是拿破仑很有理由憎恶的那些“思想家”中的一个。被拿破仑称做“思想的梦呓”的那种东西，燃起了马克思的父亲对这个征服者的仇恨，尽管拿破仑曾给予莱茵省的犹太人以平等的公民权利，并且给予莱茵省以拿破仑法典⁸——一个不断受到旧普鲁士反动派侵犯而为莱茵省人民所悉心维护的珍宝。

- 31 即使普鲁士政府可能曾经强迫亨利希·马克思改变宗教以保持他的职位，他对普鲁士君主政体的“守护神”的信念也不曾因此而动摇过。这一点，就是那些一般说来洞悉内情的人也不止一次地肯定过，他们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辩护或者至少是宽恕那既不需要辩护、也不需要宽恕的事情。即使是从

^① 即弗里德里希二世。

纯宗教的观点来看，一个同洛克、莱布尼茨和莱辛一样信奉“对上帝的纯粹信仰”的人，在犹太教教堂里也已经是无事可做的了。无宁说他更容易在普鲁士的国家教会的庇护下找到一个容身之所，因为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教会中盛行着一种相当宽容的理性主义，即所谓理性宗教，这种精神甚至在 1819 年的普鲁士书报检查令⁹上也留下了某些印迹。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放弃犹太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解放的行动，而且主要是一种社会解放的行动。犹太教并不曾干预我们的卓越思想家和诗人的伟大精神劳动。莫泽斯·门德尔森曾力图以他那微弱的火炬把自己的“民族”引导到德国精神生活的领域里去，但是白费力气¹⁰。正好在亨利希·马克思改宗基督教的那些年，在柏林成立了一个犹太青年的小组，想走门德尔森的道路。虽然这些青年人当中有爱德华·甘斯和亨利希·海涅这样的人物，但他们的努力也终告失败。甘斯，这只小船的舵手¹¹，第一个放下旗帜而皈依了基督教。海涅¹²呢，虽然他恶狠狠地骂了甘斯一句：“昨天还是英雄，今天就成了坏蛋”，但是他自己不久以后也不得不为“欧洲文化的入场券”付出了同样的代价。他们两人都在上世纪德国的精神发展中起过历史性的作用。而他们过去的那些矢志于犹太精神的伙伴们，却早已湮没无闻了。

可见，在好几十年当中，改宗基督教是犹太人中间的自由思想者在文化方面进一步的表现。亨利希·马克思和他的家人在 1824 年受基督教洗礼^①，这件事也只能从这个意义上而不能从其他意义上来理解。不过，某些外部条件，虽然并未

① 1824 年亨利希·马克思给他的孩子们施了洗礼；他本人则是在 1816 年，他的妻子是在 1825 年加入路德派教会的。